

回忆丁石孙老师

■ 文兰

1964年秋我进北大数学力学系读一年级。从第二学期开始，丁石孙老师教我们高等代数大课，教了一年，用的课本是数学力学系几何代数教研室编写的《高等代数讲义》。只记得丁老师讲课非常清楚。他在我们眼里年纪大的不得了，但现在算起来，那时他才37岁。

不久文革就开始了，丁老师是最早被斗的老师之一，因为他是“黑总支”（即数力系党总支）的成员，和校党委“陆平黑帮”一样首当其冲。1966年的6月阳光刺眼，北大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都是革命群众写的愤怒揭发和声讨。丁老师被揭发声讨的主要罪行，是他在解放前上大学时参加过一个叫“乌托邦”的组织。现在想来，丁老师参加“乌托邦”时应该是个20岁左右的大学生。但在1966年，我们这新一代20岁左右的大学生，却没几个人知道什么是“乌托邦”，都觉得那个“乌”字触目惊心，一定是个特别反动的组织，丁老师因而被认为罪行特别严重。后来才知道“乌托邦”是“理想国”的音译，是解放前一个进步学生组织的名字。但丁老师早被不由分说关进牛棚，斗了多少回，吃了多少苦头了。文革之荒诞愚昧，可见一斑。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1970年3月我被分配到河北献县农村插队，后来依稀听说北大的老师们也被送到各地基层劳动锻炼。1976年文革结束，国家满目疮痍，百废待兴，77年晚些时传出大学要招研究生的消息。那时我在献县一个公社中学教书，于是把久违的课本找了出来，发现那本丁老师参与撰写的《高等代数讲义》里还夹着一张油印的考题卷，时间是1966年1月3日，想必是我十二年前考过的期末考题，但此时已看不懂题目，不知“合同变换”、“标准型”是说些什么了。幸而这本《高等代数讲义》写得非常清晰，鼓舞了我从头开始，一点点啃，一点点揣摩，最终得以应付半年之后的研究生招生考试。

1978年10月我从献县回到北大数学系读研究生，丁老师是系主任。后来我去美国读博士，1988年再回到北大时，丁老师是校长了，我们这些被他教过的学生都引以为豪，但也没有机会去看他。再后来他就离开北大去了民盟，就更少见面了。

一晃就到了2014年。2014年是我们64级进校50周年，同学们年近古稀，殷切希望搞一个50周年聚会，准备了几乎一年的时间，不少失散多年的同学都找到了。全年级183位同学，去世了30多位，聚会时到了将近130位。聚会前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就是希望见到丁石孙老师，但听说丁老师身体很不好，不知该不该开口。我们筹备组的几个同学带着花篮去看丁老师，那时他和夫人桂老师已经坐轮椅一些年了。丁老师看上去很瘦，但听到同学们的愿望，一口答应出席聚会活动，并一再强调“我身体很好，没问题。”他为我们年级的纪念册签名题字“同学们好”，和桂老师一起与同学们在客厅里合影留念。

2014年5月10日上午，我们年级的50周年聚会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国际数学中心讲堂举行。由于门口有台阶，丁老师是坐在轮椅上由两位随行男护卫和许多同学一起抬进会场的。几十年没见面了，看到老师坐在轮椅上，同学们又高兴又难过。丁老师坐定后，同学们纷纷

拥上前去向老师问好，无数手机、照相机举在头上，“咔咔”拍照，留下许多珍贵的镜头。

聚会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。先是领导讲话，然后是同学自我介绍。同学们大多几十年没见面了，不自我介绍一下认不出来。于是议程安排每个同学做简短的自我介绍，加上几句感言。有个同学开玩笑讲了两句很短的感言，总共16个字：祝老师们万寿无疆，祝同学们永远健康。但那天参加聚会的有近130位同学，自我介绍再短，也要整整一个上午。事后才意识到，我们设计议程时犯了个很大的错误：应该在领导讲话之后就到楼外合影，合过影就可以请丁老师回去了。但我们的议程是一直连下来，直到全部议程结束才去合影。丁老师就在会场上坐了整整一个上午，从头听到尾，连洗手间也没去。他一定考虑到行动不便，来之前尽量少喝水了。这件事，我想起来就自责。这张合影现在就摆在我的写字台左手，照片是在数学中心的门外，面朝北照的。摄影师事先搭好了架子，同学们兴高采烈地站在架子上，站了几层，满头白发的瘦削的丁老师坐在第一排中间。

这大概是丁老师最后一次出席类似的活动，因为第二年，我们的下一年级，65级进校50周年，丁老师就没能出席。这一年他夫人去世了，他也住进了医院，至今没有出来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）